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青海宝卷研究

刘永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青海宝卷研究

刘永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宝卷研究/刘永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9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2635 - 6

I. ①青… II. ①刘… III. ①宝卷(文学)—文学研究—青海省
IV. ①I20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19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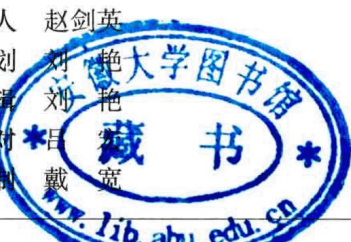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艳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戴宽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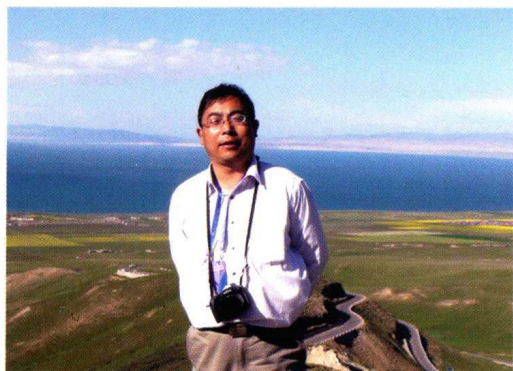
字数 327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刘永红，甘肃渭源人，文学博士，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近年来在《西北民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约二十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三项。

内容简介

宝卷是集文学、信仰、教化为一体的民间说唱的文本。青海宝卷念卷是国内所存为数不多的活态念卷，是明清以来遗存下来的“宝卷流民间宗教”的重要表现形态。青海宝卷依赖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民俗环境，呈现出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特质，具有浓厚的乡土性、通俗性和大众性的特征。宝卷的演唱、传承建立在青海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与丰富的民俗文化的语境之上，成为地域性民间文化的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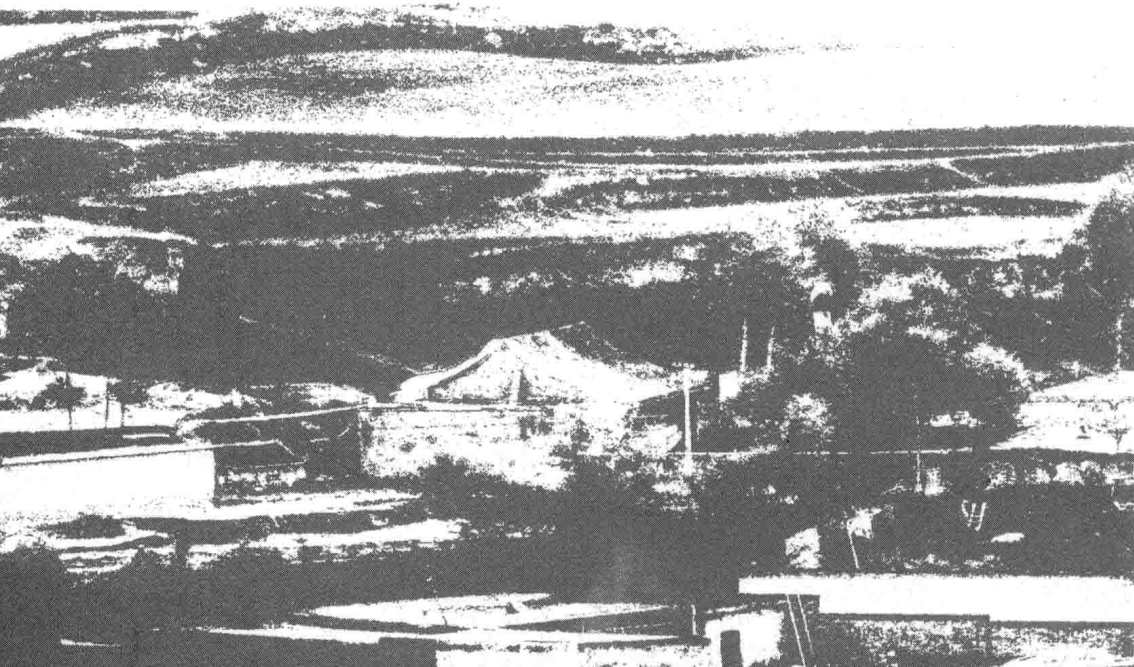
青海宝卷被民众视为神圣的文本，宝卷的念卷活动也成为一种带有信仰因素的民俗活动，对宝卷以及宝卷念卷所依存群体的田野调查，是本书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宝卷所体现的民间信仰、民间观念与民间思想，对青海宝卷的文化语境、历史、文本、抄卷、念卷、念卷组织、宝卷音乐、宝卷中的信仰与民间宗教思想以及青海宝卷与西北其他地方宝卷的关系做了开拓性的、较为深入的研究，该著作也是较为全面、系统研究青海宝卷的第一部专著。

选题策划：刘艳

封面设计：虫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批准号：09XZJ011



总 序

赵宗福

2011 年秋天，在印第安纳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和在潍坊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我提出了推进“地方民俗学”的学术设想，意在实实在在地发展繁荣区域民俗学事业。

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样式繁多，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因为此，钟敬文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总结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①。即使是分布区域很广，人数近十亿的汉族，也由于极为广泛的分布与地方化，其民俗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地方性。所以各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极其明显，不可一概而论，或者说一言以蔽之，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对具体对象进行研究。这就需要有地方民俗学的存在。我理解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就是我国诸多地方民俗学的整体概括。

由于各地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状况和学术兴趣点不同，逐渐就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倾向，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地方民俗学。特别是已经成立了地方民俗学学会和有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地区，往往在学会或学科点的主导下，基本上有自己的学术侧重点和表述风格，成果也相对集中在某些方面。如青海民俗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在 6 个世居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在青海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上，古老的昆仑神话、多民族民歌花儿与花儿会、土族狂欢节纳顿、藏族史诗格萨尔、热贡文化、各民族婚礼以及歌舞风情等等，是当地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也说明事实上具有

^①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 页。

地域特色的“地方民俗学”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

但是,不论地方民俗学如何发展与繁荣,都不可能与全国民俗学界绝缘,孤立地闭关而自得其乐。而是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愿地聚集在中国民俗学的大旗之下,至少与国内同行频繁交流,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不同风格、多彩多姿的地方民俗学,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民俗学这座学科大厦,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内涵,其地位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以上这种局面,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科繁荣。这里借用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教授的一句话:“21世纪的民俗学应当在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关联中推进自己的学科研究。”^①我暂且把他说的“乡土”理解为地方民俗学。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地方层面的民俗学研究和民俗文化土壤,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如中国民俗学会及其相关学科点的整体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和引领指导,以及世界前沿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方法创新。

事实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甚至融汇的,因为民俗文化资源是大家共享的,同时地方的民俗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价值基本上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所以对某一地方的民俗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本地区的学者,往往有外地(特别是北京)甚至国外的学者来直接研究,其成果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地方性的。比如青海的花儿、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会等,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而且与地方学者相互借鉴,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建构起了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事业。

民俗文化是我们的父老祖辈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最具有历史底蕴和生活气息的文化。她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我们的文化DNA。自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被自己所处的民俗文化所熏染、所教化、所塑造,最终把我们社会化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享用者、传承者和创造者。而我们作为民俗文化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个民俗生活者和文化传承者,还是一个一个民俗文化的田野者、探索者、诠释者,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和学术使命。

^① 佐野贤治、何彬:《地域社会与民俗学——“乡土研究”与综合性学习的接点》,《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地方民俗学者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是地方的民俗文化，但其意义不凡。一是科学地挖掘地方民俗文化内涵，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保护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尽到一个地方学者的责任；二是通过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参与和支持地方文化建设，发挥民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文明进步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三是通过民俗研究与学科建设业绩，推动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这就是作为一个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

作为地方民俗学者要真正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唯其如此，方有可能以优异的业绩来实现学术愿望，否则就只能是理想上的巨人，成果上的矮子。

学术品质基于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对学术来说就是道德品格，学术与非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就跟一个人一样，对社会对他人没有诚信，没有感恩之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正确的耻辱感和是非观，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益于社会，他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人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基本保证，而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品质的基本保证。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必须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质。

这些年来，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术浮躁之风盛行，一些人把天下利器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游戏，从概念到概念，不切实际，洋洋数十万言，管用的没几句；有的人把学问当成了坑蒙拐骗的黑市场，复制加粘贴，抄袭加改编，洋洋万言不见一个文献出处，不见自己一点个人见解，人云亦云，甚或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应有的学术严肃性和文化软实力。这种现象自然也不免污染到了民俗学界，“民俗主义”乃至伪学术甚至部分地占据了神圣的学术殿堂。这是值得警惕防范的。我们主张在民俗文化研究中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扎实严谨的学风文风，坚决反对学术不端，严格遵守学术伦理。我相信学问无愧我心，公道自在人心。

在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中，不仅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还要大力鼓励学术创新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要靠创意，科学的发展繁荣要靠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创新是人文科学的使命和责任，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必须要有理论观点上的新收获，没有创新的科研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的

全方位浪费，甚至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的地方民俗学者必须要始终不渝地追求学术创新，以创新的高质量的成果来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增光添彩。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立足地方民俗文化的实际，放眼国内国际的学术语境，以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为内核，运用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推出一批代表地方学术水平乃至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优秀成果，让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走出地区，走向全国，在国内外学术平台有一席之地，从而体现出地方民俗学者应有的价值。

青海民俗学会推出这套《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就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品质上下功夫，试图从较高学术层次来展示青海地方民俗学的业绩，同时也从地方民俗学层面来为中国民俗学学术事业添砖加瓦，共同推进“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建设。

青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地之一。而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民俗文化就是这三个“之一”的鲜活表征。从古老的昆仑神话到丰富多彩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给世人留下了神圣、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大美青海印象，同时也彰显出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十分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历来得到学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至少在唐宋以来的大量古籍文献中就有对青海民俗事象的诸多记载，而在 20 世纪前叶，出现了像杨希尧的《青海风土记》、逯萌竹的《青海花儿新论》、李得贤的《少年漫谈》等民俗志记录和评论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民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青海花儿、藏族拉伊、各民族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以及其他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出版卓有成效，至今惠及学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不仅整理出版了“民族民间文化十套集成”等大型资料丛书，而且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是近年来，青海民俗学者先后推出了《青海花儿大典》、《昆仑神话》、《土族民间信仰解读》以及《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等一批富有特色的成果；还连续举办了“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昆仑神话的现实精神与探险之路国际学术论坛”、“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端学术会议。

而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点、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的建设，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队伍的学历层次提升、学术成果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多年来对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研究与论证，得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的认可和采纳。2011年11月召开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把青海文化定位为“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正式开启了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新征程。这既是对青海民俗学界研究成果的认同，同时也为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于是，青海省民俗学会在2012年5月应运而正式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台湾“中国民俗学会”、“中华民俗文化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等国内外50多家学术单位以贺信贺函方式进行了支持。学会的成立，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从零散无依、各自为阵形成学术合力、走向集约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组织基础。

青海省民俗学会是目前青海省各学会中学历层次和学术阵容最强大的学会，目前有会员100多人，其中拥有民俗学或相近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者近80人。理事会27人中，博士8人，硕士16人。在地方学会队伍中，这无疑是一支专业素养很高、学术研究潜力很大的难得的精良部队。如何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具有团队精神的地方民俗学学术力量，充分展现他们民俗文化研究的优势，发挥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的学术大厦实实在在地尽一份力量，这是我重点思考的问题。

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民俗学会当然要顺应时代，乘势而上，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优势，在文化名省建设中积极进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看来，青海民俗学会作为本土的地方民俗学会，首先立足于青海的民俗文化实际，以青海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田野作业为基本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出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调查研究力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立足于青海不等于学术视野局限于青海地域，而是要把青海

民俗文化放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俗学学术视野中。惟其如此,才能做出具有国内国际水准的学术成果来,也才能真正建设好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在学坛上才能赢得话语份额。事实证明,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就没有相应的学术竞争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学科或学术团体。所以,必须立足青海民俗文化实际,面向国内外民俗学领域,追踪本学科前沿,了解相关学科及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动态,兼容并蓄,提升品质,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理论表述风格和学术研究实绩,不断增强学术软实力,不断赢得学术话语权,真正树立起青海地方民俗学者的形象,树立起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俗文化形象。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自学会成立之日起,我就把学会的奋斗目标定为立足青海,放眼国内国际学术语境,努力推进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也就是在采用民俗文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普遍性学术理论方法的同时,坚持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致力于青海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民俗文化研究,以独到而不俗的学术业绩来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这样的定位也得到了同仁们一致的认同。

按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追求卓越品质”的原则,学会对学术发展做出了具体安排。一是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开展民俗文化田野工作,摸清青海民俗文化家底,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二是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选择某一主题进行民俗文化研讨,力求推出一批新成果;三是积极参与青海省各级各类学术活动,多方位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四是积极策划主办或者协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借以提升学术层次和学会影响力;五是积极与其他学会合作开展民俗文化调查和学术研究。同时提出集中力量办几件学术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在会员成果中精心遴选组织,争取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民俗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这一思路,从会员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课题、优秀的硕博论文和个别确有前期研究基础的自选项目中筛选,然后统一规划,统一目标,并根据出版社和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完善,再统一推荐出版。我们的目标是做成一套具有较高品质和学术含量的纯学术丛书,计划出版20本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简单的把大家的成果集中出版。这些年来,我们以学会筹备组和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为核

心，每年积极组织省内民俗学者高标准地策划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选题确定到申报文本写定，从获批立项到开题论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如在2012年青海民俗学者获批国家基金项目10余项，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我们的“民间”形式组织学者反复开会论证申报文本的，一遍遍地修改完善，个别文本甚至经过了三到五次论证才完成，最后以学者所属各单位的“官方”程序上报获批。这就是有同仁开玩笑的“辛苦归我们，荣誉归别人。”作为民间团体的工作，不仅仅是开会的费用，还有到处找会议场所、邀请专家学者、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一次次地修改和打印文本，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当然天道酬勤酬善，多年来我们帮助策划论证后申报的民俗文化方面的项目也几乎是“无一漏网”地被获批立项。几年来的会员课题研究中，我们也是多次以不同形式参与讨论，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而一些优秀硕博论文，也基本都是在学会学术骨干的指导或协助下完成的。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是青海民俗学会（前期为筹备组）多年来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

丛书的策划在青海民俗学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我在2011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邀请赴该社座谈中，就提出了出版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的设想，得到社长总编们的赞同，回青海后与同仁们开始商量具体的丛书规划。之后在曹宏举副社长的关心下，我与编辑刘艳女士多次沟通协商，同时各位同仁按规划进行撰写或修改。2012年5月，我拜访了赵剑英社长和曹宏举副总编，正式汇报丛书立意和学术标准以及进展情况，两位领导听后大加鼓励，于是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刘艳女士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宏举副总编多次过问，具体指导，关心支持学术事业和西部文化的情怀也让我感动。所以我当然无法脱俗地要真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刘艳女士，同时也感谢多年来与我兄弟姐妹般亲密合作的青海民俗学界同仁和本丛书的各位作者。

目 录

绪论	(1)
一 西北地区现存的宝卷念卷	(1)
二 研究的意义	(4)
三 学术综述	(7)
四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18)
 第一章 青海宝卷的传承语境、历史与现状	(23)
第一节 青海宝卷的文化语境	(23)
第二节 青海宝卷的历史	(33)
第三节 青海宝卷、河西宝卷与洮岷宝卷	(45)
第四节 青海宝卷的现状	(57)
 第二章 故事宝卷	(64)
第一节 《观音宝卷》	(65)
第二节 《黄氏宝卷》	(70)
第三节 《金花仙姑成道传》	(77)
第四节 《目连宝卷》	(88)
第五节 《鹦哥宝卷》	(102)
第六节 《方四娘宝卷》	(107)
 第三章 宗教宝卷	(114)
第一节 《王母经》、《王母新诗论》、《王母降下佛坛经》	(115)

2 | 青海宝卷研究

第二节	《地母经》、《土地宝卷》、《土主真经》	(123)
第三节	《血盆报母恩经》、《太阳经》、《无字真经》	(132)
第四节	《佛说大明六字真言嘛呢经》	(141)
第五节	《老母捐书经》、《十王宝卷经》	(147)
第六节	其他宗教宝卷	(155)
第四章	青海宝卷的仪式、传承与信仰	(164)
第一节	念卷的仪式与仪式卷	(164)
第二节	仪式中的音乐	(181)
第三节	青海的宝卷传承	(192)
第四节	宝卷的评判、装帧与流通	(202)
第五节	宝卷中的信仰	(209)
第五章	宝卷念卷群体——嘛呢会	(219)
第一节	嘛呢会的历史与组织	(220)
第二节	宗教活动	(235)
第三节	念卷的群体特点	(245)
第六章	宝卷念卷的女性主体与乡土特征	(255)
第一节	以女性为中心的宝卷及念卷	(255)
第二节	乡土性与大众化的民间宗教	(261)
结论		(274)
参考文献		(279)
附录	青海宝卷目录	(285)

绪 论

宝卷是民间“念卷”或“宣卷”的宗教信仰活动中一种集信仰、教化和娱乐为一体的民间讲唱文艺的说唱底本。宝卷产生于元末明初，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藏元末明初以来的宝卷有一千五百多种，版本五千余种，^①其中专讲民间宗教教义思想的宝卷百余种，多为印本；另外大部分是讲述佛道故事、民间传说、戏曲故事的宝卷，多为手抄本。这些宝卷的搜集与研究，解决了中国民间通俗文学史上从唐变文到宋说经、元末明初宝卷的源流问题，以及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一些教派、组织、领袖和重要事件的问题，它对了解明清以来的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西北地区现存的宝卷念卷

据文献记载，明代初期演唱宝卷的活动开始被称作“宣卷”。明代正德以后，各新兴民间教派均以宝卷的形式编写宣传宗教教义的经典，演唱宝卷（宣卷）成为这些民间教派信徒的宗教活动。明末清初，演唱宝卷（宣卷）发展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民间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在南北各地流传。在北方包括甘肃河西地区、山西介休、甘肃中部洮岷地区、青海东部河湟谷地称作“念卷”；在吴方言区一般仍称作“宣卷”，江苏常熟（包括1962年从常熟地区划分出去的今张家港地区）和长江对面的靖江

^① 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地区，又称作“讲经”。由于“宣卷”（讲经）又是同民间信仰活动“做会”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又称“做会宣卷”（或“做会讲经”）。山西宝卷念卷于20世纪50年代后衰亡。8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在现代媒体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吴方言区“宣卷”活动转型为有艺人班子的专业宗教活动。

在青海东部农业地区的民和、乐都、互助、湟源、湟中等县，至今还保留着宣唱宝卷的传统。这些宝卷以河湟地区的宗教群体“嘛呢会”为载体，传播地域位于河湟谷地，为方便研究，我们称这一地区的宝卷为青海宝卷。1989年初冬在青海民和麻地沟发现的《目连僧救母》手抄本，共十卷，存八卷、佚二卷，是目连戏的剧本，据专家研究，是青海唯一的目连戏，十分珍贵。西沟乡麻地沟村的目连戏又和汉传佛教能仁寺的刀山会结合在一起。《目连僧救母》目连戏就是根据宝卷《目连僧救母幽冥宝传》（宝卷）改编的。民和发现的《目连僧救母幽冥宝传》是目连戏的最初底本。青海宝卷的念卷和抄卷在当下也保存的较为完整，民间流传有大量的2000年之后的手抄本。

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当代民间传抄宝卷和念卷活动是集信仰、教化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青海东部青海宝卷宣唱活动呈现两种形态。其宝卷念卷已不再唱前期宝卷中大量的俗曲曲牌，转而以民间小调为音乐节奏来念诵。这种简便的说唱文艺在民间易于普及。作为善行功德，一些识字的人也乐于传抄宝卷。念卷活动的参与者多为汉、藏、土等族的普通中老年人，以汉族为活动主体，一般在岁时节日如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和农闲时举行，村落中心的村庙成为地域性民俗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域。这是宝卷现存的第一种形态。宝卷存活的第二种形态与当地的宗教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宝卷宣唱是当地民间宗教的主要活动之一。当地这种多民族民间宗教兴盛于20世纪，每逢重要的岁时节日，或举行丧事活动，或祈福禳灾，或求雨除祟，都要举行念唱宝卷活动。参加者为中老年妇女，一般一个班子有十到二十来人。宣唱的文本以宝卷为主，但也融进了佛教的诸如《香赞》、《心经》、《观音赞》等世俗化的、简单易记的佛经。但当地人在这些场合不称之为宝卷，而是称之为念嘛呢经。这样的称呼一方面可能与当地浓厚的藏传佛教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吸引信众有关，从中可以看得出这些信众将自身的信仰正统化努力的程